

女学热点

编者按

近日，“后疫情时代与妇女发展——第五届中德性别平等与发展研讨会”在线上举办，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聚焦“妇女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与贡献”“新冠疫情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将性别平等落到实处的目标策略与前景展望”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和审议”四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德对话：后疫情时代性别平等如何落到实处

——第五届中德性别平等与发展研讨会新视点

■ 王向梅 李雪萍

近日，中华女子学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后疫情时代与妇女发展——第五届中德性别平等与发展研讨会”，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百余位专家学者线上参会。会议围绕“妇女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与贡献”“新冠疫情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将性别平等落到实处的目标策略与前景展望”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和审议”四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妇女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作用与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无数女性投身抗疫一线，彰显了广大妇女的家国责任与使命担当。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妇女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与贡献。

中华女子学院魏开琼教授分享了课题组关于妇联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实践路径的研究，认为妇联组织在疫情防控中既充分发挥了“妇”字头资源优势，也特别强调“联”结政府和社会资源，并对妇联组织建设要进一步优化社会化工作格局、健全群众动员工作机制、完善应急管理机制、运用性别视角维护妇女儿童特殊利益等方面进行积极思考。

中华女子学院齐小玉副教授结合中华女子学院支援湖北联合志愿服务团队的经验，分析了抗疫过程中女性的特殊生理需求及其实现路径，进而倡导增强性别意识，推动两性和谐发展。山东师范大学付妍老师则提出后疫情时代应完善对女性医务人员的保障，加强物质供给、政策制定的性别考量，打造女性医务人员友好的职场环境等建议。

天津大学博士生尚宇菲从媒介研究视角出

发，认为女性在抗击疫情中的“战士”“舍小家为大家”“普通女性”等媒介形象，打破了传统的脆弱形象和母职定位，也突破了榜样女性形象的“精英化”和“无性别”误识，呈现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兼具、主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兼容”的女性形象。

新冠疫情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新冠疫情是2020年以来人类遭遇的一场巨大挑战，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因此受到直接冲击。与会专家从全球视角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妇女和女童发展带来的影响。

德国雷根斯堡应用技术大学克莱瑞萨·鲁道夫教授(Dr. Clarissa Rudolph)分析了疫情背景下德国妇女的处境，揭示了疫情推动性别关系再传统化的趋势。她提出，疫情封锁期间，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妇女就业比男性受到更多影响，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需付出更大努力。南开大学吴帆教授梳理了新冠疫情给女性和家庭带来的问题，分析了疫情常态化时期家庭政策的需求及其满足情况，并建议在家庭政策中重视儿童与老人照料、家庭发展以及促进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等内容。

与会学者还将目光投向家庭领域外的女性处境。中国农业大学陆继霞教授聚焦疫情背景下扶贫车间面临的风险，重点探讨了女工的生产压力及其应对策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瑜骏博士综合分析了疫情下妇女在经济参与、家庭和健康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建议在后疫情时代更加重视妇女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华女子学院张丽娟教授关注疫情背景下中国女性创业活动的特点与优势，探讨了女性创业的融资困难、资本薄弱等挑战及相关政策应对。中华女子学院王献蜜副教授则提出促进女性健康和提升应对风险能力的干预对策。湖南女子学院孙继静老师

和中华女子学院杜声红老师探讨了新冠疫情之后女性的生计困境及应对策略。

后疫情时代落实性别平等的策略

妇女问题并不是妇女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解决妇女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与会专家围绕“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和“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进行了深入讨论。

德国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研究所(ISS)乌尔里克·施潘根贝尔格博士(Dr. Ulrike Span-genberg)分享了德国联邦政府第三个平权报告的主要内容，重点关注数字化过程中的性别平等，包括以性别公正的方式获得资源、利用数字化的机会及塑造数字化的进程。西安培华学院刘越莲教授解读了《联邦政府性别平等战略》中的九大战略目标，并分享了德国政府落实战略目标的具体举措。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翊研究员从细化、宣传和执行三个角度分析了疫情背景下促进妇女平等就业的相关政策措施，指出后疫情时代促进妇女平等就业需进一步细化法律责任、明确奖励规定、加强监测评估，加强妇女平等就业政策的培训宣传等。德国马克斯韦伯学院朱茜研究员探讨了疫情防控背景下全球职业女性工作模式转变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云南师范大学杜爱萍副教授则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完善性别平等与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开展家庭美德教育”等策略，认为应以家庭的性别平等推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

后疫情时代《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和审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消歧公约》),是第一个把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要求法

律化的国际条约，与会专家围绕后疫情时代《消歧公约》的履行和审议进行了深入研讨。

德国妇女协会、国际性别平等政治研究负责人朱丽安娜·罗欣博士(Dr. Juliane Rosin)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德国男女平权进程受到的威胁以及德国政府落实《消歧公约》的努力。她认为德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消歧公约》的宣传工作，同时在实施公约时关注疫情下性别差异扩大的事实风险。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原一级巡视员张立从妇女的教育、就业、参政、参加保险、生育保障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土地权益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发展事业进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戴瑞君研究员结合消歧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从法治角度总结了中国履行《消歧公约》的进展与挑战，并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设定的目标，提出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保障妇女权益的路径。北京大学白桂梅教授基于《消歧公约》的第五条，对性别刻板印象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讨论了消除刻板印象过程中各行动主体应发挥的作用和行动策略。中国政法大学刘小楠教授则从《消歧公约》第十条出发，论述了开展性别与人权课程的重要性，并分享了中国社会性别与人权教育的发展。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李勇梳理了中国提交的国家报告和消歧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会上，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利群教授、艾伯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中国区首席代表康怀德博士共同表达了对中德交流合作的重视，期待通过中德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为推进全球性别平等做出贡献。(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观点秀场

北京叙事电影中的女性境遇与时代面向

——以《城南旧事》《阳光灿烂的日子》《北京，你早》为例

近年来，在地域文化中捕捉女性足迹与社会的性别认知，成为近年来性别研究的新视点。本文聚焦北京叙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选取《城南旧事》《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北京，你早》三部影片为切入点，窥见民国北平、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风土人情的变迁，透视浓郁的京味里转型年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分析变动时代女性的生命体验、成长顿挫与精神面相。

■ 蔡洁

百年北京城发生的人和事，记录着社会变革的印迹，寄托着这片故土几代人情感追忆和忧伤感怀，成为北京叙事电影视角和意蕴阐释的焦点。《城南旧事》的胡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军区大院、《北京，你早》的公交车，从不同影片的时空转场和镜头捕捉，可以窥见民国北平、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风土人情的变迁，透视浓郁的京味里转型年代女性的生存境遇。笔者以三部电影为切入点，分析变动时代女性的生命体验、成长顿挫与精神面相。

禁锢与挣脱中的女性主体性诉求

时代风云的流转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虽有传统桎梏压抑的弥漫，但在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层面也隐喻着突围的欲望。

《城南旧事》透过孩童英子的眼睛，窥探了民国北平底层人民悲苦的生存图景：被迫卖唱、惨遭毒打的弃女妞儿，未婚先孕、爱人爱女双丧思念成病的秀贞，初次相认却惨遭火车碾死的母女，背井离乡谋生反遭丈夫欺瞒的宋妈，为供弟弟求学而盗窃入狱的小偷……胡同里的成人对这些惨状往往是“无谓的旁观者”，而年幼的英子却表现出同情理解，甚至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读懂”秀贞对亲人的思念并兑现寻回小桂子的承诺，“读懂”小偷生活的无奈而视之为友，“读懂”宋妈丧子之痛而投怀安慰等。影片看似超越儿童年龄认知的叙事，实现了对人性赤诚本真的回归。英子清澈的眼神涤荡过滤了世俗的污秽，齐耳的短发、工整的校服、白净的旗袍，对大海浪漫的想象，飞越时空的思绪，成为五四进步女学生的符号，代表着建构女性主体性身份的憧憬。



与《城南旧事》哀而不伤的节奏不同，《北京，你早》充满着焦躁苦闷、时不我待的气息。女公交车售票员艾红装扮、职业与爱情的变化流转，展现出改革开放浪潮下都市劳动女性追求变新的强烈欲望。刚出场的艾红蓬头垢脸、衣着臃肿，满手沾满蜂窝煤炭，是典型的基层劳动者缩影。艾红形象的改变起于偶遇女友子云。合资企业中的子云身着制服、妆容精致，意气风发，其新潮形象激发了艾红对时髦的渴望。职业上，艾红告别旧有的生存空间，离开公交车流水线似的行程路线、稳定却酬薄的售票岗位，跻身商品经济大潮，成为跨入未来人生关键的一步。恋爱上，艾红最终选择新潮浪漫的陈明克，这固然有被现代化交际与物质消费吸引的一面，也源于她无法扭转邹永强故步自封的个性，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而作出的尝试。

如果说艾红尚存“踏着女友子云足迹”的意味，那么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女主角米兰更富有

张力和勇气，凸显着女性掌握主体欲望的能动性。镜头跟随男主角马小军的秘密窥视，细致捕捉了她壮硕的小腿、丰腴的身体、灵动的步姿。她邀请陌生初识、性情腼腆的马小军帮忙冲洗头发，毫不避讳男性凝视的目光。在军区大院和少年男性谈笑风生，生日宴会大胆开放吐露早恋的经历，与男性一起游泳嬉戏，无不流露出她跳出传统性别规约的潇洒。值得注意的是，任职文工团的米兰称病假假，但影片却从未展示她何病之有。不过交谈中，米兰隐约道出了现实工作的焦虑，以及通过从军实现自己价值的愿望。她选择军旅家庭出身的刘忆苦，背后隐藏了政治氛围浓厚的时代里，女性内心建构主体性人格的上进渴望。

错位与变革中的女性精神面相

百年北京城市的历史图景中，旧式价值观念趋于破灭，新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信仰体系应运而生。同一时空下不同的生活群体在纷乱迷

离的十字路口出现分流，时代的弄潮儿往往与世俗价值形成错位格局，女性的精神世界也呈现出复杂的张力。

在《城南旧事》中，秀贞是唯恐避而不及的“疯子”，还是爱情的“忠贞者”和母爱的“坚守者”？这是民国北平胡同的成人世界同英子之间的认知错位。秀贞的“疯”，虽是痛失爱人爱女导致的精神错乱，但主要源自邻里的“集体性误解”：闲聊的宋妈讥笑她未婚先孕的“不洁”行为，秀贞父母为维护名节而将婴儿偷弃齐化门等。与此相反，英子对秀贞表现出好感的一面，甚至对她口中唠叨的“爱人终究会归来”“爱女尚存在世”等“疯言疯语”深信不疑。可以见得，英子扮演了与这条胡同主流价值“不和谐”的音符，不禁令人喟叹秀贞“发疯”背后的社会现实之因。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米兰和于北蓓的形象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主旋律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她们的热烈奔放，撬起了被压抑的青春躁动。米兰游走于军区大院的男性群体中间，她性感的身材、自如的谈话吸引着来访者的目光。于北蓓建构起一个自由洒脱、阳光灿烂的乌托邦，这与军区大院之外忙碌嘈杂的红色海洋世界形成“与世隔绝”的鲜明反差。于北蓓突然消失的同时，马小军偷用望远镜窥视，米兰在若隐若现的照片中神秘浮出，但二人首次见面后又突然消失。影片末尾，马小军陷入理不清的头绪，反复叩问与米兰交往的真实性：究竟何时与米兰首次相识，是否只是路上偶遇，有无去过米兰家中，有无大雨中向米兰勇敢表白，甚至怀疑米兰与于北蓓是同一人，记忆与现实、时空与人物光怪陆离的错乱，潜在投射出特定年代对前途迷茫无所适从的漂泊感和失坠感。

在《北京，你早》中，艾红的情感流转是否意味着拜金主义、爱慕虚荣驱使下的见异思迁？早先爱慕的邹永强，吸引她的是正直、忠厚、质朴的品质。然而，艾红希望摆脱公车体制的约束，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邹永强恪守的仍是子承父业、知足常乐的传统伦理，二人分道扬镳的本质是价值观念和生存哲学的错位。换言之，在改革开放初期急速变革的北京城，艾红思想解放的速度与程度，走得要比邹永强更远更广，在恋爱奔波的跌跌撞撞中，她寻找的是奋斗路上的同盟者。欣慰的是，艾红与陈明克在影片结尾被世俗“温柔以待”，拖着沉重的货物以“乘客”身份自信地重登公交车，实现了“求变者”与“留驻者”的和解，这意味着北京叙事题材的电影建构出改革开放路上的新话语与新风尚，正迎着朝阳驶向灿烂的未来。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共产党妇女福利事业史料整理及研究”(2021MS055)阶段性成果

研究视窗

《空气污染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机制分析》

作者：李月 成前 刘畅

本文基于我国城市层面空气污染数据及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5)数据,实证分析了空气污染对个体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个体劳动时间具有负向影响,这一影响对女性尤为明显,且具有稳健性。对影响个体劳动时间机制的分析表明,空气污染能够降低女性健康水平,从而对其劳动时间产生负向影响;空气污染还可能加大家庭照料负担,间接缩短女性劳动时间。基于此,本文作者提出应关注女性劳动者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建立健全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

来源：《人口与社会》2021年第5期

《对妇女的就业性别歧视界定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立法完善》

作者：唐芳

我国立法并未对妇女的就业性别歧视进行定义,对此进行界定,可以就业性别平等理论为基础,从主体、行为、后果、因果关系、主客观方面展开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实施就业性别歧视主体包括用人单位以及对就业机会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妇女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可分为直接就业性别歧视和间接就业性别歧视,二者都强调用人单位差别对待或对女性有差别与就业没有必然关系,缺乏正当性。内在的职业需要、生育保护措施和积极暂行措施构成直接就业歧视抗辩理由。就业性别歧视行为的成立不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结合上述理论,亟须对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立法进行完善。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育儿分工的影响》

作者：许琪

本文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多个维度家务分工和育儿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助于降低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但是对育儿分工的性别不平等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习辅导这一维度。分城乡、子女数量和子女年龄的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对育儿分工的影响在农村、多孩家庭和子女年龄较大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因而未来必须加强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的育儿状况及其性别分工状况的研究,只有不断降低受教育程度较高女性的育儿负担,生育政策的调整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6期

(范语晨 整理)